

## 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回顾与展望

张 斌 尹 鑫 杨 文

**摘 要** 学科体系建设是中国档案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回顾历史,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发展历经基本成型期(1952—1996年)、转型发展期(1997—2011年)、创新发展期(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实现了从单一学科向完整丰富学科体系的跨越发展。环顾当下,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对立足中国国情与深耕中国实践的重视、对学科体系和内容彰显中国特色的重视、对创造性地转化国外理论和经验的重视。面向未来,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仍需扎根中国大地,进一步提炼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元素;立足专业内涵,进一步发掘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特色元素;放眼国际社会,回应学科体系建设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参考文献 18。

**关键词** 档案学 学科体系 历史发展 学科建设

**分类号** G270

###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ZHANG Bin, YIN Xin & YANG Wen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is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s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basic forming period (1952–1996),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1997–2011), an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2012 to the present), realizing the leap from a single discipline to a complete and rich discipline system. 1) During the basic forming perio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archival scienc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d built up a relatively complete discipline system, including clerical science, archives manage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rchives management, archives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archives documentation, history of China’s archives, history of foreign archives, and archives informatization, etc. 2)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rchival Teaching Steering Committee provided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archival science from paper documents to electronic document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covering theoretical archival science, technical archival science and applied archival science. 3) In the period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ival

通信作者:杨文, Email: yangwen28@ruc.edu.cn, ORCID: 0000-0002-7459-4134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ANG Wen, Email: yangwen28@ruc.edu.cn, ORCID: 0000-0002-7459-4134)

2024年3月 March, 2024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has ushered in the best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all-round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field of archives, the dig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has been accelerated continuously, and the setting of the discipline with the object of dat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archiv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Looking 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long-term emphasis on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ractice, the emphasis 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and content to show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still needs to be rooted in the Chinese soil to further refine the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in the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specialization, and look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pond to the world's ques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times. 18 refs.

#### KEY WORDS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 0 引言

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sup>[1]</sup>,以档案和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在我国的基本任务是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服务<sup>[2]</sup>。档案学学科体系作为中国档案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是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具备“特定广泛的研究领域”的集中体现<sup>[3]</sup>,建设好档案学学科体系对促进档案学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档案工作历史悠久,以档案的产生为起点,最早可以追溯至国家的出现和文字的产生<sup>[4]</sup>,从夏朝形成档案工作至今,历经四千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档案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历史和文化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为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七十多年来,在一代代档案学人的坚守和努力下,中国档案学已经建立起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内涵丰富的学科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和发展了中国档案学理论框架与解释逻辑,逐渐形成了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当前,面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任务,国家和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正在不断赋予档案学学科新的时代内涵和建设使命。如何理解中国档案学学科的发展脉络与建设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探索档案学学科未来发展路径,已经成为档案学学科建设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政策研究法,从历史、现实、未来相结合的视角,探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档案学学科从产生到独立发展、再到自成体系的历史进程与建设经验,由此唤醒和巩固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创建发展的历史记忆,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供借鉴与启示。

## 1 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1.1 基本成型期(1952—1996年)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学学科创建于1952年,随着档案学界对档案学学科知识认识的不断深化,档案学学科的独立性、专业化和体系化日益凸显,到1996年,中国档案学已经形成了由数十门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体系。

1952年,新中国第一所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和档案学教研室建立,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历程由此正式开启,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先驱们以文书、资料、档案等为研究对象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1956年,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次获得国家层面的正式认可,标志事件是《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相继发布,前者要求“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后者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列入其中,并对其建设和发展做出明确要求。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陆续建立了档案历史与组织教研室、国家机关史与文书处理学教研室、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教研室、文献公布学教研室、技术档案管理学教研室等,初步形成了包括档案管理学、文书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事业史、世界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在内的档案学学科体系。

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壮大,我国档案学学者将档案实务领域条陈的档案经验加以知识化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由院系集体编著的档案学教材《档案学基础》(1960年),以及第一部由专业教师独立编写的档案管理学教材《档案管理学》(1962年),档案学初步实现了由陈述经验向系统阐释原则与规律的知识跃迁,开启了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序幕。在以吴宝康为代表的档案学拓荒者的带领下,中国档案学立足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建设发展需要,围绕学科的哲理、学理、道理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将计算机管理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的发展,汉字信息处理、档案自动化、档案数据库及相关学科知识逐步得以形成和发展<sup>[5]</sup>。

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推进了学科体系的丰富。1983年以后,我国开办档案学高等教育的院校数量逐渐增多。档案事业建设的旺盛需要和档案学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学科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提供了重要基础,以吴宝康为代表的档案学学者根据中国国情和学科发展需要,在既有档案学学科体系基础上,构建了涵盖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的若干主干学科与分支学科,主干学科主要包括文书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馆学、档案事业史、档案管理学、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技术应用学、科技档案管理学等,分支学科主要包括档案统计学、档案法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信息学、档案社会学、档案分类学、档案文献学、档案利用学、档案经济学、人事档案管理学、医务档案管理学、城建档案管理学、公安档案管理学、军事文书学等。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这些学科内部体系也得以丰富,并衍生了新的分支学科,如档案检索、档案信息化、电子文件管理等,此时这些新的分支学科的内容还比较简单,主要侧重于对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工作进行理论抽象后的介绍与思考,尚不完整、不系统、不成熟。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档案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我国迎来档案学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截至1996年,已经建成了包括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档案信息化

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档案学学科体系,这些学科与初创时期相比,在内容构成、实践回应、理论阐释等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丰富与深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对档案学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质疑已经不复存在。在此期间,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指引下,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和档案学研究中的应用,档案目录计算机管理、档案原文存储与检索、档案编研计算机辅助管理、档案保护计算机管理等研究主题逐渐受到关注<sup>[6]</sup>,电子文件管理由此进入档案学视野,档案学分支学科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向也由此显现。

## 1.2 转型发展期(1997—2011年)

随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档案学由原来“历史学”一级学科门类下附属于“历史文献学”的二级学科,调整到“管理学”学科门类,这一改变极大拓展了档案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为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契机。同年,全国高校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有效规范了档案学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制定、教材建设,为档案学学科体系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此双重推动下,档案学学科成为“管理学”下设的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二级学科,呈现与哲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初步交叉渗透的现象,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信息化等分支学科得以丰富和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主干学科。1997年,冯惠玲的博士学位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提出电子文件已成为记录、传达、留存信息的重要工具,顺应了国家信息化建设的趋势。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档案管理新对象——电子文件的认识与研究的深入,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逐渐形成体系。

中国档案学学科的转型发展期主要体现在档案学研究对象从纸质文件到电子文件的过渡。1997年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档案领域日益广泛的应用,传统档案工作“收、管、藏、用”的主体功能及实现形式受到信息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档案学学科环境、研究对象和边界、知识结构、人才培养定位、就业市场需求发生较大改变,档案学学科体系的解释力和应对力略显不足,为了共同应对信息化挑战,国家将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结为一级学科。受此影响,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在教学环节增加了数据库管理系统、档案计算机管理、汇编语言等课程,极大地促进了信息化环境下档案工作与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体化发展,这为档案学学科的信息化转型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国家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发展,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中国成功召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档案开放与利用提出新需求,受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迎来走向世界的良好机遇,主要表现为结合国情、以我为主,立体化吸纳欧美档案学中的有益元素,如企业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信息化等分支学科领域逐渐融入境外档案管理、涉外档案管理等相关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境外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变革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档案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应用,激活了档案信息以及蕴藏在档案资源中的知识,光盘档案、磁介质档案、电子文件、电子档案、数字档案、档案数据等新载体形式的档案大量形成,档案工作逐渐从聚焦信息资源建设迈向档案管理全流程信息化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指导下,我国逐步推进了存量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电子档案管理等各方面工作,档案学学科建设伴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也走向了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日益明显。

### 1.3 创新发展期(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日益重视,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档案领域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档案工作逐渐实现了从文献资源管理向信息资源管理、数据资源管理的跃迁,档案学研究对象也逐步实现从“纸与墨”向“数与网”的转变,研究对象的变化加速了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性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并使得以数据、档案数据等为对象的学科设置逐渐成为档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与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日益深入和丰富,并呈现出外部衔接与内部融贯相结合、理论构建与实践演进相结合、人文驱动与技术驱动相结合等特征,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档案学学科体系内容。

2012年至今,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最显著的趋势和特征就是学科进入了全面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时期。数字环境下信息技术的迭代与演进迫使档案工作进行变革,尤其是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对档案工作的环境、理念、模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趋泛在与成熟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档案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方式,档案对象管理空间实现了“模拟态—数字态—数据态”的三态演化发展<sup>[7]</sup>。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档案学者对档案数据库、数字文化遗产、数字档案记忆等实践项目进行知识提炼和理论提升,对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等实践工作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促进了档案多元论、档案后保管理论、档案记忆观等新兴学科理论的发展。

在创新发展期,档案学界根据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国际环境、技术环境的变化,在档案学学科建设中融入动态性与开放性理念,促使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应用理论体系、应用技术体系等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学科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丰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合理吸收和借鉴国外档案学研究内容和知识,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体系中增加了比较档案学。二是结合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需求,在档案应用技术研究体系中增加了文献信息管理学、档案数据管理学等,促进档案学与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管理科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发展逐渐与数字人文学术思潮深度融合,也引发了更大范围、更多线索、更广知识容量的档案学学科交叉和领域交叉,如档案学与新文科建设、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数字中国建设的契合,引发了档案学教育理念、教学结构、教育功能、教学组织的多层面变化。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档案学所在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打通了文献、数据、大数据、信息、知识等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快了档案学学科体系的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发展趋势。三是根据档案管理工作实践的发展,在档案管理学分支学科中适时增加“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专门档案管理”“档案数据管理”等内容,实现了理论性与应用性、综合性与专业性、社会性与服务性的统一<sup>[8]</sup>。

## 2 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2.1 立足中国国情与深耕中国实践

中国国情和档案工作实践是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从建立起就是为实践服务的,立足实践、依靠实践、总结实践、服务实践,不仅是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式与方法,而且也是其得以发展和壮大的基本经验。

第一,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以服务档案工作实践需要为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了对文件资料和档案的有序管理与利用,党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学高等教育,档案学建设由此得以

起步。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学、文书学、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保管技术学、档案公布学、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等学科得以建立。

第二,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充分反映和吸收档案实践经验。档案学学科建设、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密不可分,以实践为导向促进学科内部与外部、主干学科与分支学科的沟通与协调,及时吸收、总结和提炼档案工作丰富的实践样态,成为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路径。譬如,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创建离不开对民国档案管理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档案学者对民国时期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知识进行整理提炼,将从中国文件现象、文件管理经验中发现的档案现象、档案管理经验,应用到机关档案室管理和档案学术研究之中,并在学科对象、实体管理组织、管理者、管理活动研究等方面实现了新拓展,开启了更具全局性的学术表达历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民国时期政府公文文书整理开始重视效率问题,同时私人文书整理活动兴起,文书类型在古代文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件学与文书学的发展,也使得档案分类问题成为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二,近代机关档案室的出现和加强机关档案室管理的现实需要,促成了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旨的“行政效率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档案管理融入了近代机关管理的组织原则与效率思想,并逐步建立起了涵盖公文管理、档案概念、档案行政组织、档案管理原则与方法、档案保护等内容的档案学研究体系和学术表达体系。又如,档案管理学及时吸收国家关于档案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的内容,提出新的管理理念,科技档案管理学充分吸收企业档案管理的有关内容,档案信息化因鲜活的档案信息管理实践和多样化信息管理场景而产生并发展,电子文件管理因数字环境下档案管理对象的变化而得以创建和发展,档案法学因依法治国的实施和依法治档的实践而得以建立和发展。其三,档案学学科建设以时代发展和档案实践趋势为观照,加快了档案学学科数字化转型步伐,为此设立了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学、档案信息化等学科,继而形成了主要以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档案管理技术为核心的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并与公共管理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交叉学科。

## 2.2 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传承与延续的根本依托。在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进程中,重视彰显中国的历史、文化、科技等特色元素,对于历史文书学、文书学、档案事业史、档案保护技术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企业档案管理学等分支学科的内部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彰显中国历史特色。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在创建与发展进程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吸收与借鉴。新中国成立后,档案文献编纂学、文书学、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就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是在总结、归纳和提炼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以中国档案事业史为例,该学科就引用、吸收和借鉴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大量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得以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整理和保存工作历史悠久,并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我国档案学者通过深入考据和整理历史档案资料,对中国古代档案工作经验进行知识提炼,建立了历史文书学、中国档案事业史、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等学科,并逐步提升为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为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对于中国历史特色的彰显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深入研究殷商甲骨文书、秦汉竹木简牍文书、魏晋以来的纸制文书和历代文书制度,形成中国历史文书学知识体系。档案学者根据《史记》《文心雕龙》《明会典》《四库全书》《清实录》《康熙起居注》等反映中国文书演变发展历程的珍贵文献资料,参考民国时期档案

学著作《公牍通论》《现行公文程式》,编纂文书学教材;通过对自商代末年出现的太史寮等专门文书机构,西周之后出现的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等文书种类,记录王室世系的“谱牒文书”,记录法律法规的“约剂”文书,以及成为重要政务处理工具的清代诏令文书、上奏文书、官府往来文书、契约凭证文书等文书建制与文书传统的梳理,形成了中国历史文书学知识体系。其二,随着相关历史资料不断被发现,档案学者完成了《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并编纂了中国档案史教学用书,如《中国档案事业简史》《中国档案事业史》等,不仅加强了档案学的历史溯源,也进一步整理和阐释了现存不同时期的历史档案。其三,基于文献典籍编纂方法与经验,通过整理、开发、利用档案文献中的知识,汲取、整合与文献编纂活动相关的学科知识,促进档案文献编纂学在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同时,将相关学科知识融入档案学知识体系,丰富了档案学的知识领域。其四,档案学者对古代反映档案内容的黑墨、朱墨、印泥等有关记录的材料,以及龟甲、兽骨、金石、缣帛、竹简、木牍、纸、胶片、声像等档案载体材料的变化规律和档案保护的技术方法进行整理和研究,撰写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实验讲义等,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档案保护学科和第一套档案保护教材<sup>[9]</sup>。

第二,彰显中国文化特色。中国档案学是一门文化底蕴厚重的学科,这种厚重文化不仅来源于档案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和价值,而且来源于档案学学科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从文书学建设来看,文书学是以文书、文书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重点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文书和文书处理工作的概况、特点、方法、原则、内在规律,以及它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中国文书工作历史悠久,文书和文书工作作为历史的产物,记录历史和再现历史,我国的文书学就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和丰富起来的。从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建设来看,该学科以档案文献编纂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中国古代谱牒和方志的修纂经验。谱牒档案是中国乡土文化中的代表,记录了包括族源族史、人物家世、排行字辈、家训格言、族规家法等特定历史时期的家族史实。谱牒伴随汉字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记录历史时间长,涵盖社会主体多、民族范畴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谱牒文化,并作为中国文化印记之一,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谱牒档案的形成与编修。地方志编纂是档案文献编纂的重要形式之一,始自周代,历经隋唐图经、宋代方志、明清方志等演变与发展时期,也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彰显中国科技特色。观照、吸收和回应科技发展,是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从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创建与发展历程来看,科技档案管理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支学科,该学科是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我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成了大量的设计图纸和各种类型的技术文件,“技术档案”“技术资料”等术语开始形成。为解决大量科技文件材料与其他科技资料混同管理的问题,更好地发挥科技档案在生产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国家提出在科技档案工作中按专业统一管理思想,科技档案管理学由此得以创建和发展。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提出科技档案、资料是向科学进军、发展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由此推动了我国科技档案工作的发展和科技档案管理学的研究。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始培养科技档案专门人才,编写科技档案管理学教材,建设科技档案管理学学科。以1959年大连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议的召开和1960年《技术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的颁布为标志,具有国家规模的科技档案事业得以创建,档案学界对科技档案学的认识由此逐渐从感性阶段转向理性阶段。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科技档案学学科的发展更多以科技事业发展需要为考量,不断探索科技档案管理体系、科技档案服务体系、

科技档案安全体系,促进科技档案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发展,并实现了集约化、规范化、知识化管理,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科技活动的效率和效益,而且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方针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为国家的生产建设提供了科学凭证。

### 2.3 创造性地转化国外理论和经验

坚持以我为主,重视对国外理论和经验的合理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也是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早期对苏联档案学理论和经验的借鉴吸收、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发达国家档案学理论和经验的学习与借鉴。

第一,重视对苏联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档案学在以谢列兹聂夫为代表的苏联档案学专家的帮助下,通过对苏联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基本原则、实践经验、学科经验的学习和吸收,实现了对苏联档案学学科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在基本原则方面,中国档案学全宗原则的形成借鉴了苏联的芬特原则;在实践经验方面,1953年陆晋藩所著的《档案管理法》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档案管理经验,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编译的《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档案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学科经验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根据对中国历史传统的考察,将苏联文献公布学的学科经验中国化,开拓性编纂了《中国文献公布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公布学,之后,随着各地档案馆历史档案编纂实践的逐步开展,在《文献编纂学讲义》(1961年)、《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1962年)、《文献编纂学讲稿》(1963年)等材料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编纂学。总的来看,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对苏联档案学学科建设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受苏联帮助,初步建立学科概念体系。1957年,苏联帮助我国编制了中俄对照版的《档案识名手册》,确立了“全宗卡片目录”“全宗单”“编制一览的方法”“备考表”“不可分散性”等档案管理的基本概念,以这些概念为基础,中国档案学者结合档案实践,围绕档案的形式、本质、作用,档案学的概念、性质与内容,档案工作的起源、历史、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内容及其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初步建立了档案学学科的概念体系,为中国档案学学科后续的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初步建立学科教师队伍。新中国档案学创建伊始,为了解决档案学教师队伍的人员紧缺、经验不足等问题,主要采取从调干学员中抽调和培养研究生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档案学专业教师队伍。在培养的过程中,研究生还被要求独立撰写教学课程讲义,以培养他们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能力。通过吸收学生参加教学研讨、教学实验和实习活动,参与撰写和翻译教学讲义、教材等,不仅增进了学生对档案学学科知识的理解,也为中国档案学后备教师培养做好了教学经验准备,如苏联专家特别强调研究生应参加教师的教学研究会议。三是借鉴苏联课程体系建设经验,结合国情推进中国档案学课程体系建设。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与建议下,我国逐步确立了结合马列主义方法和苏联档案学原理的中国档案学课程体系建设方法。在这一方法指导下建立的课程包括:在苏联专家所编写的讲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课程,如苏联档案史、文书处理学;由中国教员编写的全部教学大纲与讲义并讲授的课程,如中国档案史;根据苏联专家留下的参考资料建立的课程,如文件材料保管技术学;苏联专家回国后由中国教员重新编写大纲开展教学的课程,如中国国家机关史、文书处理的中国历史部分、文献公布学的中国历史部分<sup>[10]</sup>。

第二,重视对西方发达国家档案学理论和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在建设历程中,科学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成分,促使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在体现本土特色的同时,持续保持与国际档案界的话语交流,不断拓宽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国际视野,提升国际地



位与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档案学者通过翻译和汇编英、美、法、意、加等国的档案资料,拓宽了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国际视野,如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英国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以及国外档案管理的政策与法规、国际标准等先后被引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对于澳大利亚文件中心保管、保护、利用文件的经验开展研究,深化了对文件中心的理论阐释,促进文件连续体理论在我国的创造性转化。在理论层面,我国学者在借鉴并吸收文件连续体模型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开展文件运动规律研究,开发了由轴、维、域三个结构要素组成的文件运动模型<sup>[11]</sup>,创新性地提出第五维度理论模型<sup>[12]</sup>等;在实践层面,我国档案学界运用文件连续体模型推进社会记忆构建<sup>[13]</sup>,推动了档案资源的社会性开发与利用,有效适应了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管理工作阶段性特征淡化、整体性特征增强的发展趋势。我国在学习和借鉴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提出的“档案后保管范式”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创新性地建立了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和方法,推进了文件档案管理的全流程再造,以及档案馆职能与社会责任的扩展重塑<sup>[14]</sup>,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兴信息技术环境下后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在学习美国“档案多元论”的基础上,主要从档案价值、档案文化功能、档案管理模式、档案教育等层面<sup>[15]</sup>,对其进行了“本土化”阐释,并结合中国国情将其应用于档案文化建设、社会参与档案治理、档案馆际协同等领域,催生了档案记忆观、档案数字记忆等理论的发展。总的来看,对西方发达国家档案学理论和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对我国档案学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 3 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未来展望

#### 3.1 扎根中国大地,进一步提炼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元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建设档案学学科是发展档案工作的需要。基于此,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未来发展,迫切需要围绕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使命,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在观照世界的同时,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国之问与人民之问;进一步提炼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更加关注中国本土档案资源,以中国档案实践作为研究起点,促进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

第一,基于学科特点建构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提炼与构建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坚持本土性、自主性、科学性学科发展立场,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专门档案学知识体系、交叉档案学知识体系三个方面推进学科体系建设。一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需要秉承守正创新意识,聚焦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关切,要传承好能够体现中国档案学学科基本要义、基本传统、基本共识、基本价值、基本理念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回归档案学学科常识、规律、本原,特别是需要围绕中国特色梳理和建构学科概念,将档案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加以总结提炼,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进一步形成档案学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增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和严谨性,最终实现对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巩固、丰富与发展。二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专门档案学知识体系,需要回应档案学各分支学科中的基本问题,研究档案学的独立性与多样性,围绕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等要素,探讨档案学学科多样化的研究对象,要在更新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知识构建的材料与方法的同时,促进知识分类和专门档案学知识体系构建,如探索红色档案学、文化遗产档案学、健康档案学、军事档案学、民族档案学等分支档案学学科

建设。三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交叉档案学知识体系,需要珍惜国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历史机遇,提升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意识,借助新文科建设契机,以档案学学科和档案科学为基础,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结合档案实践需要,坚持科学的学科和领域交叉发展方向,提炼档案学交叉学科的概念、话语、内容。

第二,基于文化自信推进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亟须提高站位,要立足中国具体国情,从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自信的视角考虑学科建设,谋求学科自主自强。具体来看,亟须兼顾历史与现实,回应时代之问和中国之问,推进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国档案工作历史悠久,与中华文化和民族记忆传承密切相关,档案对于记载与传承这些文化与记忆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中国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作为中国特色文化累积和有序传承的产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见证,对客观呈现中国人民的主体创造性特征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实现推进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需要促进中国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与管理,以此来不断丰富学科体系内容,凸显档案学学科体系的贡献力。具体需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开展中国特色档案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研究,制定和完善文化遗产档案保护与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文化遗产档案的项目研究、行业资讯与专家资讯研究,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公约》及其附属条约保护范畴,推动更多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例如,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轴线申遗相关的遗产描述、照片、影像、图表资料等历史档案及法律档案的保护与管理。二是深入研究非遗档案的载体形式及内部构造,发挥我国的档案管理体制优势和档案学研究体量优势,促进非遗档案的学科构建与学术提炼,呈现中国独特的具有多样性的文化基因与档案知识形态,挖掘中国特色档案文化的符号意义与创生机制。

### 3.2 立足专业内涵,进一步发掘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特色元素

学科建设扎根专业是其枝繁叶茂的基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社会的需求不断丰富着档案学专业的内涵和外延。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立足和紧跟专业内涵的发展变化,基于历史视角和现实视角,在不断推进自身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掘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特色元素,促进学科体系更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丰富档案学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关注学科与学术动态的交互与发展,重点围绕深化协同育人机制,建构中国特色人才培养共同体,以回应学科之问与教育之问。

第一,促进档案学学科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学科发展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对社会实践总结、反思、凝练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而成。同理,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是在观察和凝练档案现象与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需要建构的。面向未来推进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迫切需要结合人才培养需要、专业建设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加强对档案学学科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与解析,充分挖掘中国档案学学科的特色、建设规律、基本经验,解析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结构、演变与发展机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中国档案学学科走向独立与不断发展壮大的学科建设过程与标志,以及最新交叉边缘学科的发展前景,明确面向未来的中国档案学的建设路径。以档案保护学科为例,通过对档案保护历史的追踪、溯源、考究,以及对其本质与规律

的研究,厘清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经济、地理、气候、文化与档案保护实践经验及其规律发展的基本关联,由此丰富档案保护学科的理论厚度。

第二,紧扣国家治理需求。一方面,档案学学科建设要立足档案学专业特色,立足档案和档案工作在政治建设、国家记忆构建、文化强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国际合作与交流、公共危机治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民生服务、诚信社会等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作用<sup>[16]</sup>,推进实现政、产、学、研、用多元协同,提高档案学学科对国家治理的综合贡献力。另一方面,档案学学科建设要主动对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求,在遵循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兼顾档案学学科建设的特色发展和规范发展,完善档案学知识生产机制;明确档案学作为信息资源管理二级学科的定位与价值,团结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共同体,开展有目标、有组织、有计划的档案学研究;进一步规范档案学学科建设的范畴与边界,丰富档案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档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避免学科建设陷入盲目发展的窘境<sup>[17]</sup>。

第三,立足数字中国战略,推进档案学学科数字化转型。随着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档案工作环境、对象、内容发生巨大变化,迫切要求创新档案工作理念、方法、模式,立足数字中国战略发展,推进档案学学科的数字转型升级。《“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档案工作要建立档案数字治理新模式,着力开展新时代档案治理相关理论及政策研究。为此,档案学学科建设在未来亟须考虑信息技术对学科的多元影响,主动融入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进学科数字化转型,根据数字档案馆建设、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长期保管、档案数字资源管理、档案数据治理等具体实践需要,丰富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推进学科建设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sup>[18]</sup>。

### 3.3 放眼国际社会,回应学科体系建设的世界之间和时代之间

从学科史来看,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发展与壮大,都具有兼收并蓄和融合发展的显著特点。建设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同样应该防止闭门造车,用开放的态度放眼国际社会,关注和回应国际社会关注的共同议题,在一些基础学科建设方面融通古今中外,不断深化对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景的认识与理解,在新的分支学科设置上反映世界共同关切的问题,并致力于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第一,推进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国际化进程。中国档案学学科自创建以来,经过七十余年的建设、发展与积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国际档案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力。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突出“双一流”建设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统筹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基于此,档案学学科建设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借助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相关高校的合作与交流,通过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学科交流、互派访问学者等方式,强化学科国际协同,推进中国档案学学科走向和融入国际社会,向国际档案界展示中国成就,输出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档案学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要提升建设质量,还需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的有益成果,构建良好的学科生态。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和总结国外高校在档案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理念、方法、路径等优势 and 特点,比较分析中外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差异,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以我为主,合理借鉴和吸收有益经验,提升我国档案学学科建设水平。另一方面,要正视中外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差异,客观审视我国档案学学科建设的优势、短板和需求,根据国家战略调整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和优化学科设置,提升档案学学科的生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建设好和巩固好优势分支学科,按需发展特色学科和学科集群,打造多样性的

档案学学科生态系统,重视学科建设对于自主的档案学知识生产的作用,巩固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能力和建设质量,提高中国档案学学科的国际地位。

第三,在学科建设中主动回应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总是走在时代前列,以回答时代问题为己任,以解决世界共性问题为使命。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不应仅服务于中国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而应放眼世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研究世界共性问题,如档案数据治理、文件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数字记忆等,承担起为世界服务的重要使命,不断吐故纳新,主动对国际档案实践问题作出回应,加强档案学学科的战略性和前瞻性规划设计,与国际档案界一起共同推动档案学学科建设。

#### 4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珍惜历史机遇,把握历史方位,加强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积极探索解决学科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升档案学学科核心竞争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是档案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与现实条件,学科创建与发展的深厚历史积淀为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日益繁荣的档案学高等教育事业为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队伍保障,档案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为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基于此,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理应进一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深化创新发展,开展互学互鉴,促进交叉融合,继续推进中国档案学学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

**致谢:**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国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 冯惠玲,张辑哲. 档案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 (FENG H L,ZHANG J Z. Introduction to archival science[M].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6:1.)
- [2] 陈兆祜,王德俊. 档案学基础[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5:4. (CHEN Z W,WANG D J. Foundation of archival science[M]. Beijing:Archives Press,1995:4.)
- [3] 闫静. 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85. (YAN J. C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66[M].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21:185.)
- [4] 周雪恒. 中国档案事业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7. (ZHOU X H. History of China's archival enterprise[M].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1994:7.)
- [5] 孙淑扬. 档案管理与计算机教学大纲[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1-28. (SUN S Y.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syllabus[M]. Beijing:Archives Press,1987:1-28.)
- [6]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档案计算机管理实用手册》编委会. 档案计算机管理实用手册[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1-645. (Institute of Archiv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Editorial Board of *The Practical Manual for Archival Computer Management*. Practical manual for file computer management[M]. Beijing:China Archives Press,1996:1-645.)

- [7] 钱毅. 技术变迁环境下档案对象管理空间演化初探[J]. 档案学通讯, 2018(2):10-14. (QIAN 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ival object management spa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8(2):10-14.)
- [8] 王英玮, 陈智为, 刘越男. 档案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1-8. (WANG Y W, CHEN Z W, LIU Y N. Records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cience[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5:1-8.)
- [9] 尹鑫, 张斌. 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学术体系[J]. 图书情报知识, 2021, 38(5):4-14. (YIN X, ZHANG B.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1, 38(5):4-14.)
- [10] 张斌. 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创立期的探索与发展——基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史档案的考察[J]. 档案学通讯, 2023(1):4-10. (ZHANG B.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unding perio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rchives in new China: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the histor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23(1):4-10.)
- [11] 何嘉荪, 金更达, 叶鹰. 文件运动理论模型初探——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之二[J]. 档案学通讯, 2004(1):18-22. (HE J S, JIN G D, YE Y. A primer on document motion theory models—a study of document motion theory II[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04(1):18-22.)
- [12] 王玉珏, 宋香蕾, 润诗, 等. 基于文件连续体理论模型的“第五维度理论”[J]. 档案学通讯, 2018(1):24-29. (WANG Y J, SONG X L, RUN S, et al. From records continuum theory to “fifth dimension theory”[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8(1):24-29.)
- [13] 吕文婷. 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认知历程与特征分析[J]. 档案管理, 2021(6):15-19. (LÜ W T. Cognitiv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sinicization of document continuum theory[J]. Archives Management, 2021(6):15-19.)
- [14] 冯惠玲, 加小双. 档案后保管理论的演进与核心思想[J]. 档案学通讯, 2019(4):4-12. (FENG H L, JIA X S. The post-custodial theory of archives: evolution and core concepts[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9(4):4-12.)
- [15] 李子林. 档案多元论在我国的研究与应用[J]. 档案学通讯, 2017(6):36-41. (LI Z 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rchival multiverse in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7(6):36-41.)
- [16] 杨文. 档案与国家治理关系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反思[J]. 图书情报知识, 2022, 39(2):52-61, 72. (YANG W.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ve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2, 39(2):52-61, 72.)
- [17] 杨文, 姚静. 档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数字转型——基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的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1):99-107. (YANG W, YAO J.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inking on the renaming of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telligence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to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3, 67(1):99-107.)
- [18] 张斌, 杨文.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2):41-56. (ZHANG B, YANG W.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3, 49(2):41-56.)

张斌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尹鑫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杨文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 2023-07-20)

2024年3月 March, 2024